兩岸關係的再平衡：一個雙層賽局的觀點

石　冀　忻

（中華跨域管理教育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摘　要

2008 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兩岸關係趨向和緩，在相互合作的氣氛中，2010 年 6 月，兩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項協議被視為兩岸關係的重大進展。然而，3 年後，作為 ECFA 後續協定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卻遭受到了民間大量阻力而遲遲無法實行，還在 2014 年 3 月爆發了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可以說是反應出臺灣民意的變化。而同時，在 2012 年習近平上臺以後，中共的各項政策也都做了為幅不小的改變進而也影響中共對臺政策的優先性。本文以兩階段賽局（two-level games）為架構，分析民眾偏好的改變對該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及其政策應調整的方向。並以兩岸關係為例，說明當臺灣民眾及中國新領導人的政策偏好發生變化，而且變化的方向一致時，例如同時都更加重視臺灣的主權問題，此時兩岸間將可能爆發重大衝突。但是如果雙方所關注的焦點不同，雖然可能造成僵局或關係的倒退，但卻會是一個雙方都能滿意的結果。

關鍵詞：兩階段賽局、偏好改變、兩岸關係、兩岸協議

*　*　*

壹、前　言

2008 年 3 月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在馬英九政府所承認的九二共識下，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雙方政府展開接觸，並於 2008 年 6 月由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領代表團前往北京，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舉行會談，就「兩岸包機」及「大陸人民來臺觀光」兩項議題進行協商。並於 6 月 13 日正式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

DOI：10.30389/MCS.201803_61（1）.0004

旅遊協議」。這是繼 1998 年第二次辜汪會談之後，兩會之間重新啓動的制度性協商。①經過二次會談，就直航、觀光等三通議題達成基本共識後，兩會隨即於 2009 年開始推動「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以下簡稱：ECFA) 的簽訂。經過四次的會談與三次正式的協商，2010 年 6 月由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領代表團前往重慶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舉行會談。會中雙方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及「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雙方的經濟及貿易交流有了更緊密的往來以及法制化的基礎。

然而，依據 ECFA 第四條所簽署，作爲 ECFA 後續協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簡稱：CSSTA) 卻於 2013 年 6 月 21 日簽訂後至今未能生效。其間還於 2014 年 3 月爆發了太陽花學運。在太陽花學運過後的第二年，2016 年，在經歷 8 年對大陸較爲友善的馬英九執政後，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同時民進黨及偏臺獨立場的時代力量也在立法院取得了超過六成的多數席次。爲什麼在 8 年內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呢？臺灣民衆難到不擔心兩岸關係會出現「地動山搖」②嗎？在理論上有無合理的解釋？

文本運用「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s) 的理論來分析及說明臺灣內部民意的轉變對兩岸協議及談判結果的影響。同時也從雙層賽局的另外一個面向來進行分析，指出臺灣民衆也會根據大陸內部政治情勢的變化來調整其投票的策略。本文運用數理模型爲基本架構進行演繹推理，再佐以民調及相關政策分析做歸納分析，相互印證，將舊有的理論模型再向前推進。除了對臺灣內部的政治情勢如何影響兩岸關係，以及兩岸關係如何影響臺灣內部的政治發展進行詮釋外，也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進行預測。基本上，兩岸未來的一段時間將會是冷和的局面，只要臺灣不持續往臺獨的方向前進，在一定的範圍內，北京方面對臺灣當局在統獨立場上的模糊表態不會有太激烈或是非常積極的反制措施，但同時卻也不會在經濟、外交以及人權方面給予臺灣太多的善意。

本篇論文主要目的在於將舊有的理論模型再加以延伸修訂，期望能更準確地對現實的政治發展進行釋解及預測。在內容的撰寫部分，本文先就寫作動機及緣起進行概述。接著介紹相關的文獻及理論模型，並且將現有的模型做進一步的推演，考量進偏好改變的因素，探討臺灣海峽兩岸內部政策及政治局勢所發生的變化。再利用數理模型進行分析，闡釋兩岸內部民意及局勢的轉變如何產生交互的影響最後達成均衡。最後對本文做一總結及檢討並就理論未來發展及改進的方向提出討論。

註①　參見海基會網站，協商概述－第一次江陳會談。

註②　參見大公網 (2016)。

貳、文獻探討

「雙層賽局」的理論最早是由 Robert D. Putnam（1988）所提出。研究從 1976 到 1979 年間所舉行的 G7 ③高峰會。觀察到其中 1978 年於波昂所舉行的第四次峰會，即使在各方內部意見紛歧的情況下，最終也還是能達成協議。因爲主談的決策者在對外談判前會先考量國內的情勢，在判談桌上提出一個能被國內主要勢力認同的方案。在民主國家中對談判者而言，國內的支持與否可能比協議的本身還來得重要。一個不能被國內支持者所接受的方案，主談者是不會輕易接受的。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當談判的對手有必須達成協議的壓力時，國內強力的反對者可能反而會成爲己方談判的籌碼，迫使對手接受己方的條件。

Milner and Rosendorff（1997）以此思路作了進一步的推演。他們利用此一概念建立起一個以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爲基礎的兩面向（two-dimensional）數學模型。Milner and Rosendorff 以關稅貿易談判爲例，利用模型說明在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之下，如果立法部門對外較不友善，保護主義較重，行政部門在對外談判時就可以利用立法部門的反對勢力將談判拉向對自己較有利的方向。但是，如果行政和立法的對立太過嚴重，行政機關反而會因此而失去主導權。但無論如何，只要立法機關的立場非常明確，行政機關總是能使協議順利地通過立法機關的批准。

Milner and Rosendorff 又進一步的分析，在本國政治情勢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時。例如，在談判期間正好遭遇本國立法機關的期中選舉，而選舉結果又難以預料之時。代表談判的行政團隊會變得較爲保守，以免出現極端的立法機關使得對外談判所達成的協議遭到否決。然而，既使行政團隊已事先做了防範，協議仍有被否決的可能性。而當政府分裂的情況越嚴重，協議被否決的可能性就越高。並且，由於行政團隊難以掌握立法機關的傾向，行政團隊也會因此而失去利用立法機關的反對意見作爲對外談判籌碼的能力。

在 Putnam 以及 Milner and Rosendorff 等人的分析及模型中強調的是國內的政治情勢對國際談判的影響，並且從主談者的角度出發，說明一個成功的對外談判者在談判時需同時綜合考量國內外的因素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判斷。然而，不只國內情勢會成爲影響國際情勢的因素，反過來，國外的壓力同樣地有可能成爲影響國內政治勢力的因素之一。

將雙層賽局的模型應用在兩岸關係上。以 Milner and Rosendorff 的模型作爲基礎進行分析，吳秀光、石冀忻（Wu, Samuel S. G., and Chris Shih）（1998; 2009）發現，當雙方主談的代理者有意妥協時，即使兩邊的委託者（民衆或主要政治勢力）相互敵視的情形相當嚴重，仍然有可能將雙方立場較激進的委託者帶向妥協的結果。反過來說，

註③　包括美、英、法、西德、意、日、加拿大。

當雙方主談者立場較激進時。則縱使雙方之委託者都在立場上較具妥協性，握有議程主控權的代理者不見得會如其所願。當某方內部的歧見較深，也就是代理者和其委託者的立場相距甚遠時，如果還能產生妥協的結果，其結果將對該方特別有利。然而在某一方委託者特別激進的情況下，卻也有可能會發生，雖然存在著「四方皆可獲利」之妥協空間，但是最後卻無法達成協議的結果。也就是說，在兩岸關係中，如果有一方的民眾對對方有很深的敵意和不信任感，既使原本有一個可以增加彼此間利益的機會，也會因此而消失。

林繼文（Lin, Jih-wen; 2000）的模型則由中國大陸、臺灣（兩競爭者）及美國（調停者）及其國內（選民）在統/獨單一議題上的談判出發，假設行爲者會衡量議題選項與其理想點之間距離，選擇最靠近其理想點的選項。而政府的決策者會在該議題面向上依「如何能得到國內最大的支持」：爲選擇標準，選擇其政策位置。模型同時分辨出三種不同政治制度：獨裁、威權及民主。並推演出，1.國內的中位數選民對現狀愈不滿，國內對領導人改變現狀的要求就愈強。而對現狀的不滿卻也使得領導人改革的空間變大。2.當領導人的目標是國內支持極大化，將現狀微幅調整並靠近國家中位數選民是最好的策略。此一策略也可使對方報復最小化。3.決策制定的門檻越高，則改變現狀的難度就會越高。如果兩個國家進入衝突狀況，一個較大的國內致勝集合將會危及國際穩定。因此，在 Putnam 的模型中，能在國內促進國際協議的機制可能會在國際衝突中成爲一個負面的因素。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高門檻將使得激進的政策被提出的可能性降低，衝突的行爲也會因而降低。4.當兩個國家間的中位數選民越接近，則這兩個國家越不可能去平衡他們之間的衝突，反而會互相對峙。如果一個國家從它的國內致勝集合選擇了一個極端的結果出來，則和他對峙的國家，其反應也會變得很激烈。和 Putnam 當致勝集合越大則越有可能達成協議的論點不同的是，若其中一方刻意去製造一個挑撥的行爲，用以擴張他們自己國內的致勝集合，將會增加對手國的壓力並採取更激烈的反應。當國內獲勝集合擴張的越大，則越多極端者會結盟，反而使得溫和的協議被提出的可能性更小。雙方形成一種惡性循環。這個過程可能會一直持續，直到有一邊決定訴諸於武力（暴力）來解決爭端。

除了國內政治會影響到國際談判的結果。從另一個面向來說，國外的壓力也可能成爲影響國內政治局勢的重要因素（Evans, Jacobson and Putnam. 1993; Chiozza and Goemans 2004; Debs and Goemans 2010）。特別是在面臨戰爭的壓力時，不同體制下的領導人會做出不同的決定。在民主體制下，由於政策領導者的權力較不穩固，在國際衝突中容易因爲本國所蒙受的損失而遭到撤換或被選民所唾棄，因此民主體制下的領導人對衝突較爲敏感也會付出較多的心力避免衝突的發生（Bueno and Siverson 1995; Bueno, Morrow, Siverson and Smith 1999; Debs and Goemans 2010）。

林繼文（2000）則認爲，決策制定的門檻越高，改變現狀的難度就會越高。如果兩個國家進入衝突狀況，一個較大的國內致勝集合確實會危及國際穩定。因此，在 Putnam 的模型中，能在國內促進國際協議的機制可能會在國際衝突中成爲一個負面的因素。此外，當一個政權是獨裁政體時，致勝集合是單獨由獨裁者個人的理想點所決

定。因此，若他的位置越遠離現狀，則他越有動機去改變現有的政策。更進一步來說，一個國家可藉由是否和他國合作或採取對抗的態度來影響他國領袖的去留（McGillivray and Smith 2000; Smith 2009）。Smith（2009）利用數學模型的推導指出，一個國家可選擇只和其所喜好的他國領導人合作，一旦其所不悅的領導人被選出即採取對抗的態度，使得選民會因爲合作帶來的好處以及衝突帶來的損失而選擇該國較中意的領導者。Smith（2009）進一步地推論，一個強大的國家，例如美國，當某一國的領袖是他們所喜愛的，即使是獨裁政權也會加以支持，甚至是希望獨裁政體能維持下去，使其所支持的政治領袖能長期執政。反過來，要是一國的領袖是他們所不喜歡的，而該國又是獨裁政體，此強國就會設法支持該國的反對人士將該國的政治體制改爲民主制度，以方便影響其政治領袖的去留。

在兩岸關係及國際情勢中，國內也有學者認爲美國及中國大陸的態度是影響臺灣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④吳秀光和石冀忻（2009）的研究則指出，在兩岸關係中，可能會有鐘擺式的效應出現。當兩岸由不接觸到開始談判後，雖然在一開始可能會朝相互妥協的方向發展，但是這個妥協可能會偏離了多數民衆的理想點。讓立場較爲激進的政治人物出現了操弄的空間。進而可能誘使民衆選出較爲激進的領袖而形成鐘擺的效果，在下一期使得雙方轉變成爲較爲衝突的關係。

然而，吳秀光和石冀忻（2009）並未考量民衆理性的預期以及學習的能力。若民衆能考量進衝突對他們可能所造成的損失就不會輕易地偏離相互合作的現況。尤其是，偏離了合作的狀態不但使得先前的妥協前功盡棄，還有遭受到對方報復的可能性，使得損失更加的擴大。除非民衆的偏好已經發生改變，衝突對他們而言沒有效用上的損失。

在偏好的改變（preference change）方面，學者認爲有幾個原因會使得人們改變他們的偏好。其中包括信念修正（belief revision）（Van Eijck 2008; Grüne-Yanoff and Ove Hansson 2009; Lang and van der Torre 2010）。人們的信念來自於對事實的認知，當人們發現有別以往的新證據或新的知識時，信念就有可能因此而改變。而信念的改變有可能進一步改變人們對事物喜好的順序，促使人們做出有別以往的選擇（Cadilhac, Asher, Lascarides, Benamara 2015; Dick and Liu 2009）。除了新知的取得，改變也有可能來自於新的經驗（Johansson, Hall and Chater 2011）。

此外，當價值觀或是社會規範發生改變時，偏好也會發生改變（Grüne-Yanoff and Ove Hansson 2009）。另外一方面，除了偏好會影響人們的選擇外，人們的選擇反過來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偏好（Carlos and Shi 2015; Chen 2008; Chen and Risen 2010; Ariely and Norton 2008）。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同樣的事，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受。因此要多經歷、多感受幾次才會明白自己眞正的喜好。Ariely and Norton（2008）同時也指出，一個人對某件特定事物的喜好度其實是不穩定的，會受到外在因素，如天氣等的影響。當人們本身所處的環境或條件發生改變時，選擇事物的優先順序也會發生改變。除了

註④　參見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

上述的原因，當議題出現新的面向也會影響到偏好的變化（Dietrich and List 2011）。

偏好的改變運用到公共領域，尤其是兩岸關係上，當民眾發現原本所期待的政策效果沒有出現。例如，簽訂 ECFA 之後預期的所得增加沒有出現；或是該議題不同的面向或影響力被突顯出來。例如，兩岸的經貿協議雖然能促進經濟成長，但同是也會增加國家安全的疑慮；或是新的社會或政治議題的產生。例如，民眾開始認爲居住正義、低薪資、高工時等分配正義及勞動權益等相關問題的重要性高過經濟成長的重要性，而兩岸關係的進展或任何的協議都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此外，當民眾對領導者的信心及信賴感發生改變時，也可能會使得民眾對該領導人的決定感到懷疑甚至是產生先入爲主的負面觀感。例如，執政黨在內部問題上的失敗會使得民眾對該黨的能力產生質疑。當面臨兩岸或國際問題時，執政黨所做出的承諾或願景就得不到民眾的信任而不願加以支持。

本文運用 Milner and Rosendorff（1997）以及吳秀光、石冀忻（1998; 2009）的模型並做適度的調整及延伸。考量進民眾偏好的改變對政府決策及領導人產生的影響。相較於林繼文（2000）及吳秀光、石冀忻（1998; 2009）的分析，本文指出當臺灣內部的民意以及北京領導階層發生變動時，即使雙方的理想點未改變，均衡點仍有可能會發生變動，甚至是走回頭路，往起始點的方向移動，而且此時雙方的效用卻還能同時增加。至於會倒退到什麼程度則受到偏好改變程度的影響。在林繼文（2000）的單一面向模型中，當均衡點已經落在雙方的理想點之間時，這個均衡點是不可能再發生改變或者是移動的。而在吳秀光、石冀忻（1998; 2009）的文章中，雖然提出了臺灣民眾所選出的領導人會在溫和與激進間擺盪的鐘擺效果，然而根據其模型的假設條件，這樣的情況不應該會發生。因爲在彼此間充分掌握資訊、對對手的認知也沒有改變的情況下，臺灣民眾應該會知道任意改變雙方已經達成的共識會引來對方的不快，進而採取報復的行動而使臺灣蒙受損失。

參、兩階段博弈模型

一、基本模型

假設現在有兩個國家，國家 A 和國家 B，國家 A 的決策者以 P_1 表示之，國家 B 的決策者則爲 P_2。在民主的體制下 P_i（$i=1$ 或 2）可以是該國的中位數選民。這二個國家面對二個不同面向的決策 X 和 Y，國家 A 的民眾可以決定 X 面向的決策，而國家 B 可以決定 Y 面向的決策。例如，自由貿易協定中，二國可決定各自的關稅要不要往下降，降多少，因此 X 和 Y 就可以代表 A 國和 B 國的稅率。X 和 Y 也可以代表是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中雙方同意讓渡出的司法管轄管權幅度。例如，雙方需決定要不要提供對方所需的物證或引渡犯罪者；何種罪犯或嫌疑人可以被引渡等。本文假設行爲者充分了解彼此的理想點、彼此偏好與偏好變化，沒有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及資訊不對

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況存在，因而能根據對手的變化而適時做策略的調整。

雙方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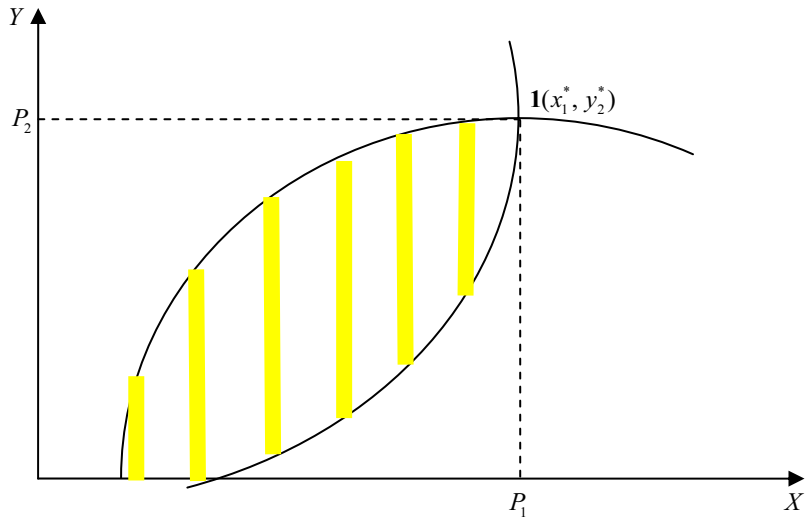
$$U_i(X,Y)=K_i-\alpha_i(X-x_i^*)^2-\beta_i(Y-y_i^*)^2\text{，}i=1\text{或 }2$$

其中，(x_i^*, y_i^*) 代表決策者 P_i 的理想點，也就是使他效用最大、最滿意的那個決策組合，離這個點越遠效用就越低。α_i 和 β_i 代表決策者 P_i 給與 X 和 Y 的權數，也就是分別對 X 和 Y 的重視程度。當 $\alpha_i=\beta_i$ 時表示 X 和 Y 對決策者 P_i 而言同等的重要。此時，$U_i(X,Y)=K_i-(X-x_i^*)^2-(Y-y_i^*)^2$。可以在以 X 爲橫軸 Y 爲縱軸的座標平面上表示成類似等高線以 (x_i^*, y_i^*) 圓心的無數個同心圓稱之爲無異曲線。在同一條無異曲線上的每個點的座標組合對決策者 P_i 來說都一樣的好，並且，越靠近圓心的組合決策者 P_i 的滿意度就越高。相反的，離圓心越遠滿意度就越低。

在沒有進行任何的溝通或協商的情形下，P_1 和 P_2 各自選擇對其最有利的政策，P_1 選擇 $X=x_1^*$，P_2 選擇 $Y=y_2^*$。因此，在沒有任何溝通或協商的情況下，最初的起始點組合就是 (x_1^*, y_2^*)，如下圖中的點 1。這個組合也是所謂的奈許均衡點（Nash equilibrium），也就是雙方都選擇對其最有利的決策點，不管對方是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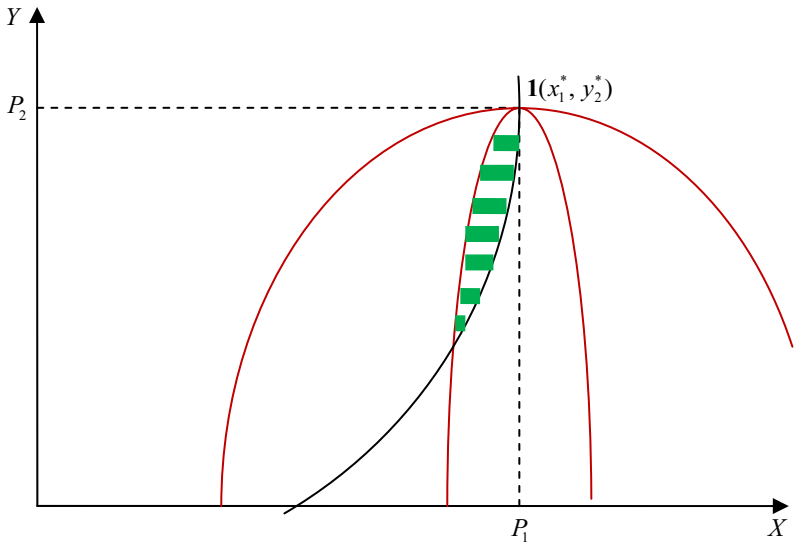
此時，二個決策者的無異曲線會交會出的區域如圖 1 所示黃線部分，就是雙方可以透過談判、協商達成協議來增進彼此利益的可能區間。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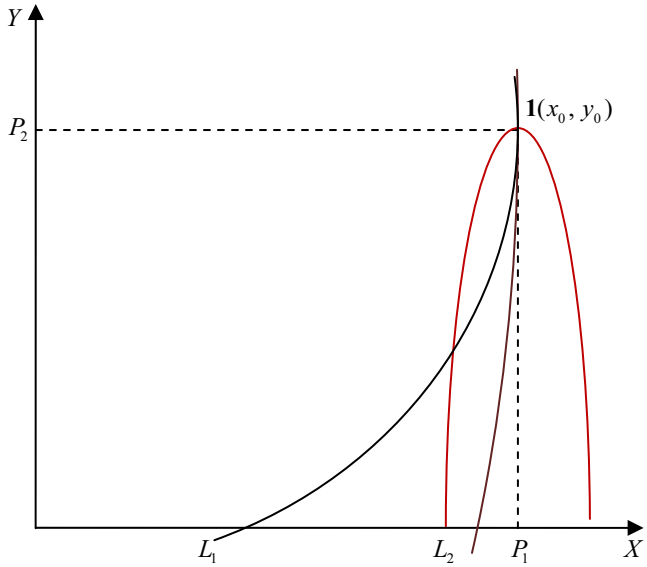
但是當決策者 P_1 認爲 X 的重要性要高過 Y 時，$\alpha_1>\beta_1$，P_1 的無異曲線變爲 X 軸較短的橢圓形，要維持同樣的效用，P_1 在 X 面向所做的一點退讓必需從 P_2 處取得大量的 Y 作爲補償。此時，P_2 如果希望能和 P_1 達成協議增進彼此利益就必需對 P_1 有更多的退讓和妥協。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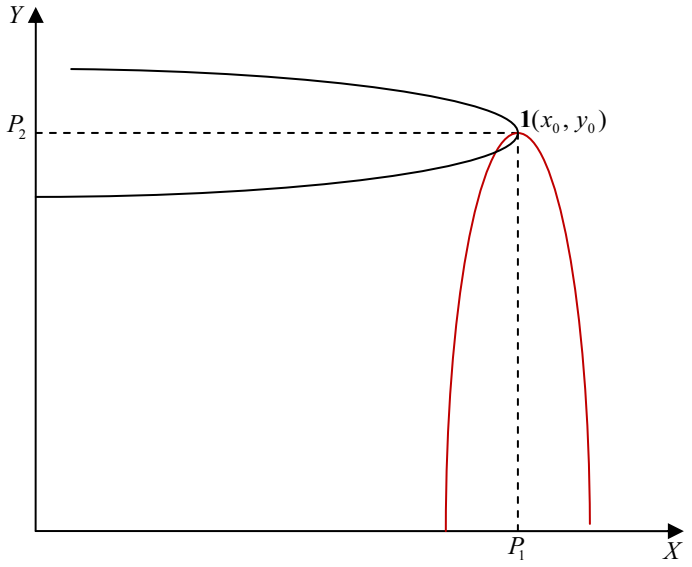
要是 P_2 和 P_1 一樣，同樣地較重視 X，$\alpha_2 > \beta_2$，如下圖。此時 P_2 會願意在 Y 面向給予 P_1 大量的退讓只爲換取少量的 X。

圖 3



當 P_1 和 P_2 雙方對各自所擁有或掌控的資源或議題面向比較重視，$\alpha_1 > \beta_1$ 且 $\beta_2 > \alpha_2$，此時雙方會失去達成協議增進彼此利益的空間 (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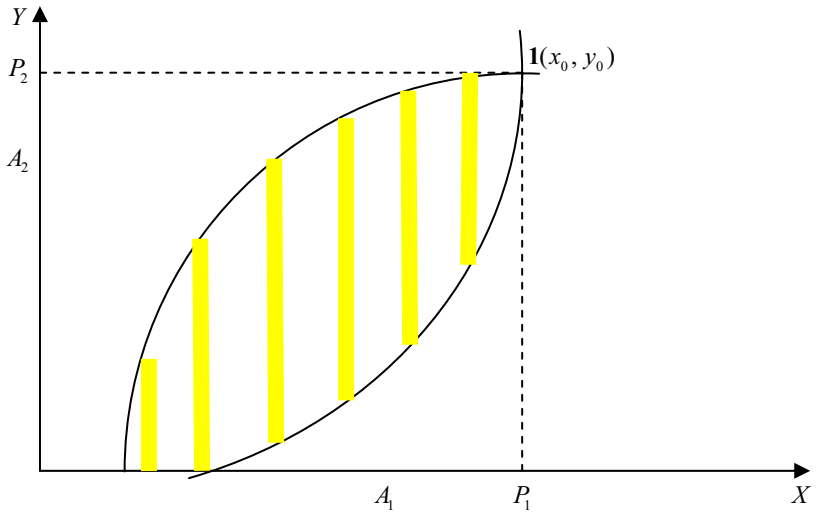
圖 4



二、雙層賽局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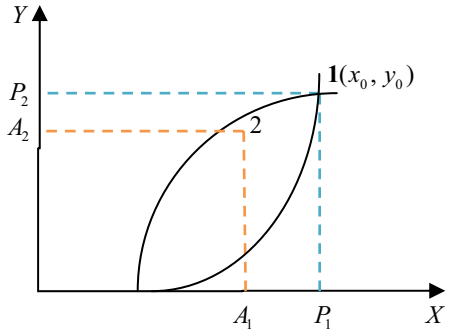
假設 P_1 和 P_2 是分別是 A 國和 B 國的中位數選民，他們的偏好決定了該國政策的位置。兩國民衆希望能透過協商增進彼此的利益，因此必需派代表或是由政府部門出面協商。爲了能順利達成協議，選民會選出立場和對方較接近的官員或代表，如下圖 A_1 及 A_2 ，和對方進行談判。

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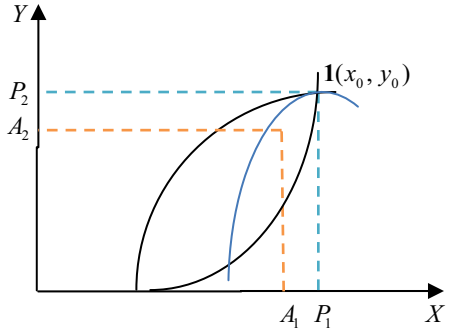
在沒有互信基礎下，雙方會先站住自己的立場和對方談判，因此會在下圖點 2 達成協議。

圖 6



當 P_1 對其自身所擁有的資源或其所掌控的議題重視度增加，則雙方談判的空間就會縮小往 P_1 靠，P_1 也比較會傾向選出一個立場和其較爲接近的政府官員或談判代表。

圖 7



三、兩岸關係模型

在兩岸關係中，臺灣可以決定要不要承認九二共識或一中原則，甚至是宣布和大陸統一；也可以選擇制憲改國號，宣布成爲和中國完全沒有關係的一個新國家。而中國大陸可以決定是否要給予臺灣自由開放的空間讓臺灣人可以在大陸自由旅行及交易，同時也不干涉臺灣在國際上生存及活動的空間，或是緊縮臺灣人在大陸的居住、貿易等自由並且在國際上積極地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及國際活動的參與。其中 X 軸代表「臺灣和中國大陸分離的程度」(the level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而以 Y 軸代表「對臺開放的程度」(the level of openness initiated by mainland China)。

X 軸右邊的極端表示臺灣完全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而爲一主權獨立國家，而最左邊極值代表將臺灣完全的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Y 軸的最上端極值，代表中國大陸對臺灣採取全面性的封殺完全不給臺灣生存的空間。最下端極值代表中國大陸對臺灣全面開放讓步的政策。兩軸相交的點代表兩岸和平統一，臺灣成爲中國一省，但臺灣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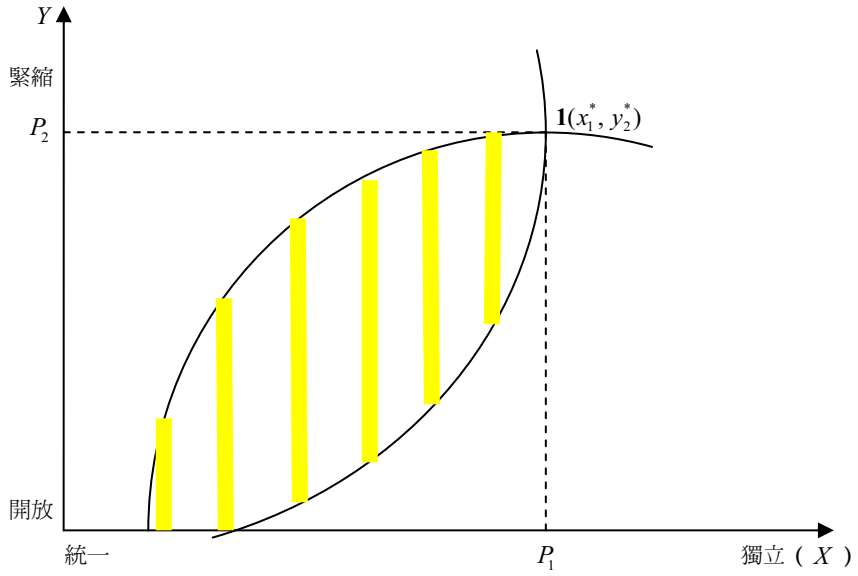
此外，因爲臺灣屬於民主體制，政府的決策官員由人民選舉產生，民意的動向會對政府的決策形成制約，一旦政府的決策違背民意太多就可能會在選舉中失利而遭到撤換。因此在本模型中臺灣方面同時考量進執政者及選民的偏好及立場。而在大陸方面，因其目前的政治體制屬於威權體制，權力集中在少數甚至是個人的身上，不像民主國家，民衆可以利用選舉直接替換政府官員或是民意代表，因而民意的影響力是直接且顯而易見的。中國大陸眞正的民意爲何不但難以衡量，其對政府官員也沒有直接的約束力，政府的政策是否受到民意的影響以及如何受到民意的影響都難以評估。尤其是習近平，如前所述，上臺後隨著反腐行動逐漸擴大，習近平的權力也不斷集中，成爲中國近年來權力最大、最爲集中的領導人。⑤此外，即使是在民主國家，只有當主流民意的立場比執政者更爲極端或是對某些特定議題有較強烈的好惡時，才會對執政者產生實質的約束力影響政策的走向。而目前也沒有明確的資料指出大陸民衆在臺獨等相關議題上的立場較中共高層更加地極端或是把臺灣問題看得比房價、物價、環境污染及貧富不均等問題還來得重要。因此本文暫時不考慮民意對大陸政府決策的影響。

在 2008 年以前，由於二岸缺乏互信，缺乏溝通，因此彼此都堅守各自的立場不願妥協讓步，雖然有相互合作的空間，但是卻無法形成共識增進彼此利益。當時陳水扁政府的主張是一邊一國，這個主張在各民調中皆獲得超 50%受訪者的支持。⑥然而，這個主張也使得兩岸關係陷入僵局。

註⑤ 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於 2013 年 5 月的雜誌不僅以習近平作爲封面，還給他穿上了帝王龍袍。CNN 稱他是繼鄧小平之後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時代》（Time）則認爲習近平是自毛澤東以來累積最多決策權的中國領導人，對各項政策擁有最全面的掌控力。甚至有學者認爲，如果毛澤東的權力度是 10 則習近平的權力達到 9 的說法。參見張煒（2016）；新頭殼（2017）；博訊（2017）；Time（2016）；CNN（2017）。

註⑥ 2002 年 8 月 4 日，TVBS 新聞臺所做的民調，54%同意一邊一國論，29%不同意，16%不知道。2002 年 8 月 8 至 9 日，TVBS 新聞臺所做的民調，仍有 52%同意。2009 年 7 月 21 日，遠見雜誌民調中心發布關於民衆對於兩岸現況看法的民調，結果認爲兩岸目前是「兩個各自發展的國家」占 82.8%，「同屬一個分裂的中華民國」占 4.9%，「同屬一個分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者占 0.7%。

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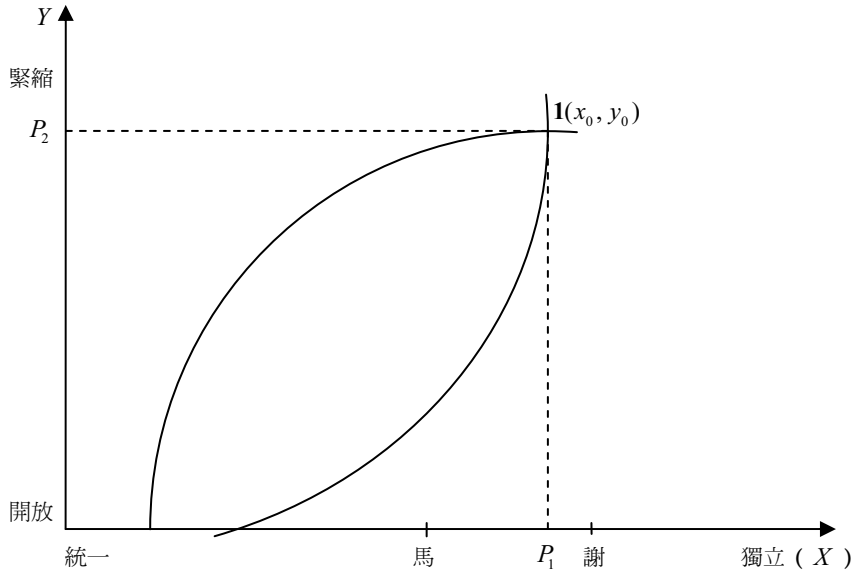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根據 2006 年的一份民調顯示，有超過六成的民眾認爲兩岸直航有利於臺灣經濟，⑦且有近五成的民眾則認爲不直航將影響外國對臺投資。此時兩岸卻只有少量的直航包機。因臺灣方面執政的民進黨認爲臺商包機對臺灣經濟上助益很小、沒有必要在政治上犧牲。再者民進黨認爲中國大陸不值得信任，必須避免臺灣單方面依靠中國大陸，擔心損害臺灣主權、人權、經濟與國家安全。北京政府則要求所有兩岸間領導階層的協商，必定要建基於「九二共識」，這與陳水扁政府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北京政府堅持既然雙方政府未有共識，不准許兩岸半官方機構海基會和海協會進行協商，增加了兩岸包機進展的難度。2004 年還曾因爲臺灣選舉的緣故讓當年的臺商春節包機胎死腹中。

2008 年臺灣的總統大選，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中，國民黨的候選人馬英九主張「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民進黨的候選人謝長廷則提出憲法各表（Two Sides, Two Constitutions），主張以《中華民國憲法》（含《憲法增修條文》）治理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治理大陸，兩岸對等，互不隸屬，依憲法有特殊關係。立場接近於李登輝所主張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兩國論）。雙方及中位數選民的立場可以表示如圖 9，其中，P_1代表中位數選民的立場，其決定了最後由誰勝出。

註⑦　參見遠見民調（2006）。

圖 9



雖然謝長廷的立場較爲接近主張維持現狀的中位數選民，但馬英九似乎較可能和對岸達成協議。最後，馬英九也獲得絕大多數選民的支持以近 766 萬張票，58.45%的得票率當選總統。⑧

2008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就任後，2008 年 6 月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即率領代表團前往北京，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舉行會談，針對兩岸包機及大陸人民來臺觀光兩項議題進行協商，並於 6 月 13 日正式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開放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正式啓動兩岸週末包機。此後兩岸又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逐步完成各項的協議，擴大開放及交流的規模。並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在重慶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擴大並深化兩岸的經貿交流。此時兩岸關係的均衡點可用圖 10 的點 2 來表示之。

ECFA 簽訂後，陸委會委託中華徵信所做的民調顯示，兩岸簽署經濟協議（ECFA）後，有 61.1%受訪民衆滿意 ECFA 成果 62.6%的民衆認爲 ECFA 有助於臺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59.2%覺得 ECFA 對臺灣經濟長期發展有好的影響。⑨另份民調則顯示，支持臺灣與大陸簽定 ECFA 的民衆有 47.1%，不支持的則有 33.9%。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看過 ECFA 十六條條文的民衆有 63.7%支持簽定、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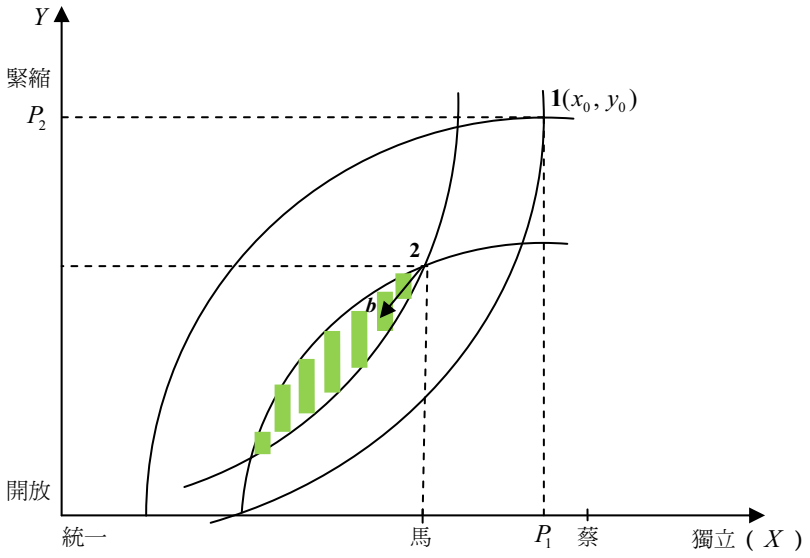
註⑧ 在 2008 年的選舉中，馬英九的勝出有包括陳水扁的貪腐以及執政失利等的影響。但本文主要是在探討民衆的偏好與立場和政府兩岸政策間的關連性。而在兩岸關係這個面向上，馬英九的主張合乎當時臺灣主流民意的期待，因此也給了馬英九一個空間可以大幅的調整兩岸政策，而調整後的結果也能被當時多數的民意所接受。本文模型的推演主要是在說明上述的關係而非主張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上的立場在 2008 年的選舉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註⑨ 參見中央通訊社（2010）。

表示不支持。該民調也顯示，44.7%受訪民眾認爲兩岸簽定 ECFA 對臺灣利大於弊，35.6%認爲弊大於利，2.2%表示利弊各半。同時，36.3%民眾表示因爲完成簽署 ECFA 而對馬總統的兩岸政策信心有所增加（其中 8.8%增加很多、27.5%增加一些），30.5%表示信心減少（其中 18.7%減少很多、11.8%減少一些），13.7%表示並未因簽定 ECFA 而改變，有 19.5%未明確表態或仍抱持觀望。至於看過 ECFA 條文的受訪民眾有 50.1%對馬總統兩岸政策的信心增加，30.9%表示信心減少。

由民調可以顯示，馬政府和對岸所簽訂的協議確實在當時是得到民眾的支持，並使民眾的滿意度（效用）增加，儘管需放棄一邊一國的立場。也因此，雖然民眾認爲馬英九偏統的立場偏離了自身的立場，在 2012 的選舉中馬英九仍然擊敗了偏獨的蔡英文而獲得連任。⑩同時民調也顯示，多數民眾支持繼續用九二共識進行兩岸協商。⑪下圖也顯示，第一次協議簽訂以後，後續雙方仍有繼續合作的空間。雙方也在 ECFA 的架構下積極進行後續的協商，並在 2013 年 6 月 21 日，兩岸兩會在中國上海市舉行第九次高層會談中完成了關於開放服務貿易的協商，簽署了《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並向外界公布了開放清單。

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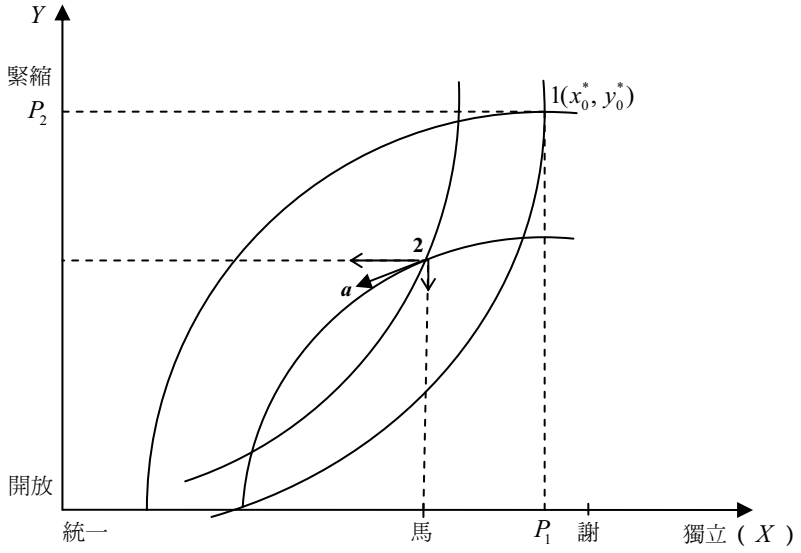
然而，兩岸服貿協議雖然是依據 ECFA 而來，卻不像 ECFA 一樣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至今遲遲未能施行。根據 2014 年 3 月，臺灣指標民調電話訪問調查顯示。當問及民眾，若立法院直接通過服貿協議對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利弊時，32.7%認爲利大於弊、35.8%認爲弊大於利、4.9%認爲利弊各半，26.6%則未明確表態。而當問及對國家

註⑩　參見「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12 年選舉民調第 6、7、8 題。

註⑪　參見「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12 年選舉民調第 2 題。

安全和主權的利弊時，21.2%認爲利大於弊、50.0%認爲弊大於利、3.3%認爲利弊各半，25.4%未明確表態。⑫基本上，顯示民衆認爲兩岸服貿協議在經貿利益上得到的少，但是在主權及國家安全上犧牲的多。因此，服貿協議在政策面向上移動的方向可用下圖箭頭 a 表示之。由圖 11 的箭頭 a 可看出，該協議移動的方向已超出了民衆容許的範圍，也因此得不到民衆的支持。

圖 11



更進一步的分析，ECFA 當初能獲得多數民衆的支持是因爲有六成左右的民衆認爲簽訂 ECFA 有利於臺灣的經濟發展，同時也有助於臺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然而，經過了 3 年，跟據 2013 年 6 月的民調顯示，當問及民衆兩岸簽訂 ECFA 後對臺灣經濟有無助益時，28.3%認爲有幫助、48.9%表示沒幫助，22.8%則未明確表態。⑬同時，自 2010 年 6 月至 2014 年年底止，這三年半中，僅有 2013 年 7 月於紐西蘭完成臺紐經濟合作協定的簽署及 2013 年 11 月和新加坡洽簽完成臺星經濟夥伴協定，這使得民衆對兩岸交流所能帶來的利益產生懷疑。另外一方面，這段期間食安問題、廢核議題、所得分配問題、薪資凍漲、物價上漲以及居住正義的問題相繼爆發，使得經濟成長的議題在民衆心目中的重要性及優先性產生了變化。

此外，由於八八風災、美牛事件、核四抗爭、白衫軍運動、太陽花學運、頂新食安事件。以及執政黨內部的馬王政爭、張顯耀事件等。使馬英九總統滿意度從 2008 年執政初期的 41%一路下滑，最低曾到 11%，不滿意度卻逐步上升。並且自 2012 年 7 月林益世涉貪案發生後就一直在 70%左右的高檔盤旋。⑭而隨著滿意度的下滑以及不滿

註⑫ 參見臺灣指標民調（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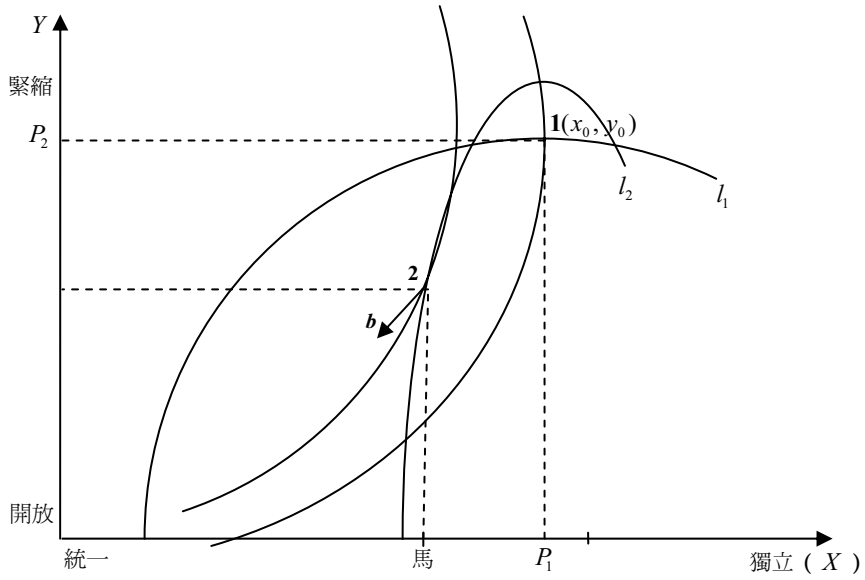
註⑬ 參見臺灣指標民調（2013）。

註⑭ 見 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16）；臺灣指標民調（2016）或臺灣智庫（2014）。

意度的上升，馬政府的公信力逐漸喪失。另外。民調也顯示越來越多的民眾認爲自己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廿到廿九歲年輕族群自認是臺灣人的比率最高，約八成五。⑮

這樣的變化也改變了選民無異曲線的形狀。選民對開放兩岸交流所能達成的效果失去了信心，因此北京再多的讓步都很難換取臺灣民眾在主權問題上的妥協。代表性選民的無異曲線由形狀 l_1 變爲 l_2。此時雙方原本可能進一步談判妥協的空間消失了。任何往左邊的移動都會造成臺灣民眾的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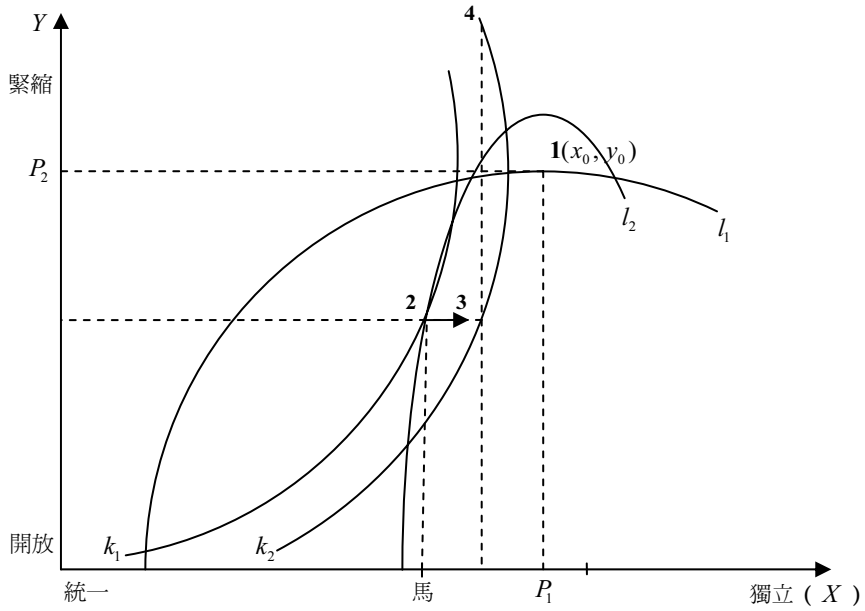
圖 12



這個時候，臺灣人會有動機想將現況往右邊（獨立）移動，如圖 13，由點 2 往點 3 移動。但此時中國大陸方面會因此而有效用上的損失，如圖，無異曲線由 k_1 移動至 k_2。北京當局有可能因此而採取報復的行動，緊縮對臺灣的經貿交流及臺灣的國際外交空間，將現況再由點 3 移動至點 4。因點 3 及點 4 同在無異曲線 k_2 上，對中國大陸來說沒有損失，但是對臺灣而言卻是極大的打擊，這也就是所請的「地動山搖」。臺灣方面可能會因此而不敢任意移動政策位置，呈現既不敢進也不敢退的狀態，兩岸關係因此陷入僵局。

註⑮　參見聯合報（2016），〈聯合報民調／73%自認爲是臺灣人 46%要永遠維持現狀〉。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8），〈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 年 06 月~2017 年 12 月）〉及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6），〈臺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

圖 13



然而，如果偏好或政策優先次序改變的不只是臺灣選民。自習近平上臺後，對內一方面要大力打腐掃貪鞏固權力，⑯另一方面還要面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問題。⑰對外急欲發揮其影響力成爲一個崛起大國。⑱使得中國大陸領導階層的偏好或施政的優先順序也可能因此同樣的發生變動。臺灣問題的重要性下降，內部經濟轉型等問題的嚴重性

註⑯ 自 2012 年習近平上臺後，大力推行反腐敗工作，2 年內共查處了超過 10 萬名的官員。其中，包括了周永康、令計劃等中共黨內機構、國家機關與政協官員（副部級及以上）共 106 人，解放軍軍官和武警警官（副軍級及以上），包括了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共 51 人。藉著反腐工作，一方面整頓內部領導，培植人脈，另一方面也攏絡民心，使其權力更加的鞏固。參見陳仁澤（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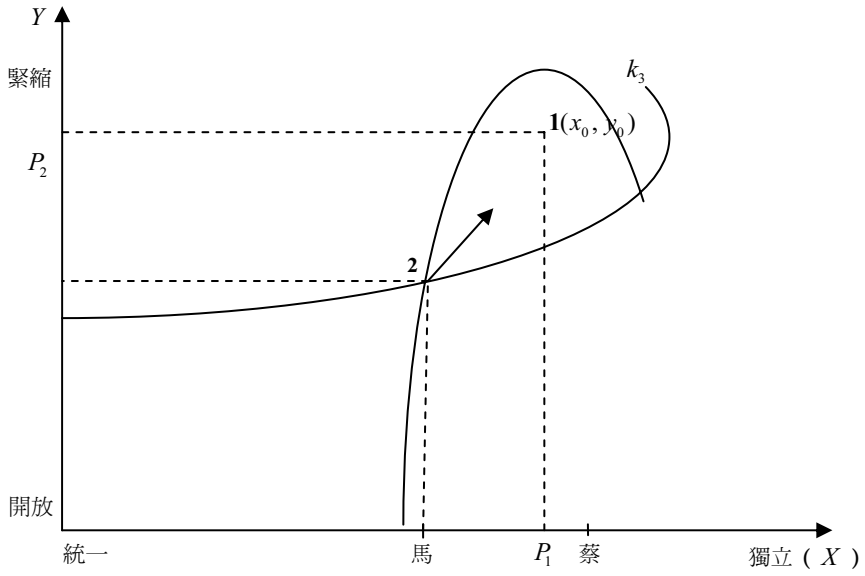
註⑰ 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6 年 1 月 19 日發布 2015 年經濟成長率，受到製造業成長趨緩的衝擊，第四季 GDP 年增率 6.8%，全年同比成長 6.9%。創下 1990 年以來最低成長率。面對經濟成長下滑的問題，習近平－李克強上臺後致力於去槓桿化，強調「不出臺刺激措施」，同時進行結構性改革，向市場放權讓利。2014 年 10 月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創新投資與融資機制，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公共建設以及服務的提供，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增加民間參與公共投資，積極地開發民間的力量。參見華爾街日報（2013）；央視網（2014）。

註⑱ 在區域發展方面，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縮寫爲 AIIB），簡稱亞投行，提供資金給包括東南亞國家協會在內的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作爲促進亞洲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平臺，並且藉此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又提出「一帶一路」作爲中國大陸對外經濟的主要戰略。

在全球性的事務上面，在朝鮮問題、氣候變遷等議題上，中國也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積極參與。2017 年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在各方憂心川普「美國第一」及孤立主義的思想會使得美國不再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時，中國外交部官員甚至表示中國願意承擔起世界領導者的責任。參見 BBC 中文網（2016, 2017）；中國氣候變化信息網（2016）；沈旭暉（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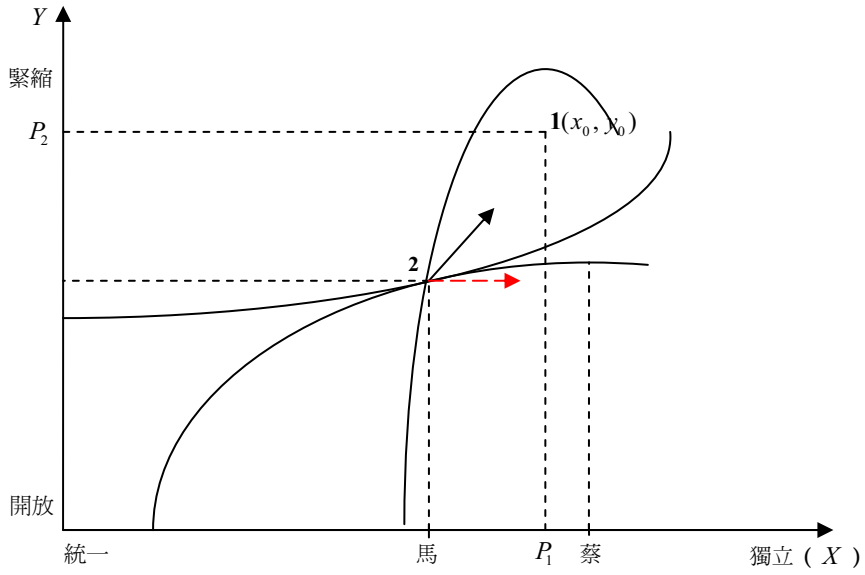
上升。進一步使中國大陸方面的無異曲線也會跟著發生變化，變得較爲陡峭，如下圖（圖 14）k_3，北京當局將不願再積極地給與臺灣本土的企業或產業單方面的讓利來誘使臺灣民衆改變統獨立場。然而亦如圖 14 所示，此時點 2 的右上方出現了一段空間，在這個範圍內，兩岸關係發生了倒退但雙方的效用卻因此而增加了！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如果臺灣民衆對兩岸經貿所能帶來的利益不再期待，同時又認爲對岸因內部權力鬥爭問題或經濟成長衰退等問題而無暇顧及臺灣，就有可能會選出立場較爲偏獨的總統將政策位置朝己方拉近，如圖 14。但是倒退的幅度受到偏好變化程度的限制。偏好改變的幅度越大就可能越倒退。反之，倒退的幅度就會受到限制，一旦超出了對岸所能容許的範圍還是有可能遭致嚴重的報復。此外，模型也顯示，一旦雙方的關係因爲偏好的改變而倒退，未來想要修復就更不容易了。因爲雙方妥協的意願將會較先前降低。

圖 14



但是如果新選出的總統不敢輕忽兩岸關係所帶來的影響，他就會選擇維持現狀，如圖 15。

圖 15



肆、結論與展望

2008 年馬英九以超過 756 萬張的選票以及總統直選後的最高得票率 58.45%，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同時挾立法院 81 席，將近 4 分之 3 的國會席次及多數民意的支持。經過多次協商之後，2010 年兩岸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兩岸間的交流也進入新的里程。海峽兩岸間對立的情勢不僅趨於和緩，甚至可以說是公開地走向相互合作的階段。然而，在該協議簽訂後兩岸的內部政治情勢卻也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動。

在臺灣方面，ECFA 通過後，雖然 2010 年經濟成長率一度高達 10%，但隨及趨緩下滑到 2%至 4%之間，2015 年甚至不到 1%。此外，薪資成長長期停滯及房價高漲、食品安全及貪腐等問題使得馬英九及其執政團隊的聲望及民眾的信賴感嚴重受創。在大陸方面，2012 年習近平上臺，新的領導人面臨著不同的局勢和挑戰，尤其是內部的權力的掣肘以及經濟發展的瓶頸。爲鞏固權力、因應社會結構的改變以及國際情勢的變化，習近平政府在內政、外交以及經濟發展上面都做了不小的調整。

中共的新領導人在施政的優先次序上的更動，帶來新的變革以及新的政策取向。這些新的作風可能會使得臺灣人產生中共領導人對臺灣問題重要性的優先次序發生改變的印象。進而使臺灣民眾認爲兩岸關係中的政治立場可以因此而朝向自己所偏好的方向做調整，而不須要再繼續委屈、妥協。與自身立場較爲相近的國家領導人也會因此而產生。如果臺灣民眾的判斷是正確的，在一定的範圍內，新的領導人就能順利調

整政策而無須擔心會遭到過於嚴厲的報復行動。縱使是經貿交流因此而有些許倒退，也都會是在臺灣民眾可承受的範圍內。

然而，如果臺灣新的總統認爲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高過主權議題，在這種情況下，既使他自身以及支持者的立場都偏向臺灣獨立，爲了避免中國大陸當局限縮遊客的人數或經貿的往來與交流，將不會輕易地改變現狀。此外，當對手爲專制集權的政治體制時，如果能確實地瞭解該國領導人的偏好，尤其是在領導人轉換時。就能有效地根據前後兩領導人之間的差異，經由模型的分析掌握對手的底線，而在未來的談判或施政中取得先機。

本文主要在探討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以及主流民意的政策偏好發生變化時，其對手國該如何因應，彼此間的關係可能的發展方向爲何？相較於以往的靜態模型，本文延伸說明國內情勢的改變如何影響對外的談判以及協議的簽訂。同時，從另一個面向也說明對手國內部局勢的變化如何影響到本國的內部政治局勢的改變。界定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會產生鐘擺效應或是政策的搖盪。本文的模型也提醒民主國家的執政者，當民意發生變化時，可能的運作空間會如何的發生變化，應當要如何因應才不致於遭受到民眾的抗拒與反彈。並且以兩岸關係爲例，說明當大陸領導人變動時，在北京當局的治國方略改弦易轍下，臺灣民眾可能會產生的反應。未來如果能根據本模型建立相關指標將能提供決策者更具體的幫助。

此外，本模型假設局中的每位參與者都有充分的訊息，清楚知道彼此的立場、偏好以及偏好的改變。但現實中，彼此不一定清楚對方立場或偏好的變化，因而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情況。將風險的概念導入模型中，有可能得出雙方行爲變得更加謹慎的結果。除此之外，兩岸之間也可能會存在著誤解。尤其是臺灣民眾，⑲對事實的認知的落差可能導致錯誤的判斷。但是不同於訊息不確定模型，在參賽者的目標函數中加入一個機率值。這種錯誤認知的模型中，參賽者沒有風險認知的概念，也因此在其目標函數中並無機率值的存在。參賽者自認爲面對的是一個確定的情境，儘管和事實不符。這樣的一個模型也許更能反應現象中臺灣在兩岸關係中所面臨的內部危機與挑戰。但是要如何建構這樣的一個模型，還需要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本文使用 TVBS、遠見、聯合報、臺灣指標民調以及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等機構所做的民調作爲分析推理的依據，其中有些機構也許會被質疑其政治立場的問題。然而，本文所使用的模型強調的是相對趨勢的變化而非絕對的值，各家機構所做的調查

註⑲　根據杜克大學牛銘實教授所主持的研究指出，超過 60%的臺灣民眾認爲如果因爲臺灣宣布獨立而導致臺灣與大陸的戰爭，大多數的臺灣人會挺身抵抗，但是如果問他們自己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只有約 15%的受訪者表示願意從事包括武力在內的抵抗。同一調查也顯示，一旦臺灣發生戰爭，有 47.7%的受訪者認爲美國會出兵幫助臺灣，認爲美國不會出兵的占 37.3%。但美國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於 2014 年 10 月所做的調查顯示，僅 26%的美國受訪者支持美國出兵介入臺灣戰爭。這些調查顯示臺灣一般民眾對內部及外部情勢的認知和事實有不少的出入。同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對大陸民眾以及大陸領導人的認知上。參見牛銘實（2016），〈「2016 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報告書〉，美國杜克大學亞太安全研究中心。以及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14）。

雖然有數字的高低不同，但是其趨勢走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中國大陸方面，本文利用中共的政策走向來推測臺灣問題在其領導者心目中的優先次序。習近平自 2012 年上臺後就忙於對內鞏固個人權力，對外拓展經貿及外交影響力，較少針對臺灣問題進行談話或指示，推測臺灣議題目前非中共施政的核心。事實上，在習近平上臺以前，臺灣問題可能早已不是北京當局首要解決的問題。不過，如同前述針對臺灣民意變化的探討，對本模型而言，強調的是趨勢上的變化而非絕對的值。

從另一方面來說，依據本模型的推論，如果對北京當局而言臺灣問題的重要性不變，一旦臺灣往臺獨的方向傾斜，北京將可能採取極爲嚴厲的報復行動。但自蔡英文當選總統後，兩岸關係處於冷和的狀態，尚未有嚴重之衝突。2017 年 3 月 26 日的博鰲論壇中，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甚至提出了「一中分治」的新觀點。⑳相較於北京原本只提一中而不談各表的九二共識，其實是一種讓步。公開承認了臺灣目前分立自治的地位。依據本文的模型，只有在臺灣問題的重要性下滑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此一妥協的空間。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本模型是正確的，我們可以用歸納法來驗證臺灣問題在北京當局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否發生改變。進而再依據推論的結果來擬定兩岸政策。而可以加以驗證以及可以作爲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也正是本文模型推論的價值所在。

除此之外，如前述，臺灣民衆是依據其認知來決定其行爲，但是其認知並不等於客觀的事實，不過我們可以從其對手的反應來印證其認知是否正確。當然，臺灣民衆或政府在決定其投票意向或政策方向時；以及北京當局在擬定對臺方針或是思考對臺灣政治局勢的改變該如何回應時，也可能是依據對國際情勢，特別是對美國態度的認知下所做的決定。一個考量進決策者判斷錯誤可能性的模型以及一個考量進外部第三勢力影響力的模型都將是未來須要再致力的目標。

*　　*　　*

（收件：106 年 1 月 13 日，接受：106 年 10 月 13 日）

註⑳　林犀（2017）。

Rebalanc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A Two-Level Game Model

Chris Shih

Assistant Researcher
Cross Boundary Management Educational Foundation

Abstract

On March 2014,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broke out in Taiwan in protest of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CSSTA) after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was signed just 4 years prior.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signified a shift of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Meanwhile, in 2012, Xi Jinping took the office as the new leader of Mainland China. In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with new challenges, Xi has different policy priorities from his predecessor. In this paper, I employ a two-level game model to analyze how the change in Taiwan's public opinion indirectly influences Taiwan's diplomatic policy. I also us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at when Taiwan's new public opinion and Mainland China's new leader both change in the same direction, for example, with Taiwan's sovereignty issue as a common focus, a big conflict may break out. However, if they do not share a common focus, even at the expens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deadlock or backtrack, both sides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a new situation.

Keywords: Two Level Game, Preference Change, Cross-Strait Relations, Cross-Strait Agreements

參 考 文 獻

BBC 中文網，2016，〈英媒：習近平「一帶一路」戰略重塑世界經濟〉，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7/160701_press_review，查閱時間：2017/04/14。BBC Chinese. 2016. “Yingmei: Xijinping ‘yidai yilu’ zhanlue chongsu shijie jingji” [British Media: Xi Jinping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o Reshape the World Economy]. (Accessed on April 14, 2017).

BBC 中文網，2017，〈中國：在需要之時願意承擔世界領導者角色〉，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718982，查閱時間：2017/04/14。BBC Chinese. 2017. “Zhongguo: Zai xuyao zhishi yuanyi chengdan shijie lingdao zhejuese” [China: Willing to Assume the Role of World Leader When Needed]. (Accessed on April 14, 2017).

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16，〈馬英九總統施政八年滿意度民調〉，http://other.tvbs.com.tw/export/sites/tvbs/file/other/poll-center/0505041.pdf，查閱時間：2016/06/05。TVBS Poll Center. 2016. “Mayingjiu zongtong shizheng banian manyidu mindiao.” [President Ma Ying-jeou eight years of policing satisfaction servey]. (Accessed on June 5, 2016).

大公網，2016，〈「九二共識」不牢：兩岸「地動山搖」〉，http://www.takungpao.com.hk/taiwan/text/2016/1017/31303.html，查閱時間：2017/04/10。Takungpao. 2016. “‘Jiuer gongshi’ bulao: liangan ‘didong shan yao’” [‘The 1992 Consensus’ is the Proven Foundation for Future Peaceful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ccessed on April 10, 2017).

中央通訊社，2010，〈ECFA 滿意度逾 6 成〉，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007060034-1.aspx，查閱時間：2015/05/10。Central News Agency. 2010. “ECFA manyi du yu 6 cheng” [ECFA Satisfaction over 60%]. (Accessed on July 6, 2017)

中國氣候變化信息網，2016，〈《巴黎協定》成功通過 中國扮演重要角色〉，http://www.ccchina.gov.cn/Detail.aspx?newsId=59753&TId=58”%20title=”《巴黎协定》成功通过%20 中国扮演重要角色，查閱時間：2017/04/14。China Climate Change Info-Net. 2016. “‘Bali xieding’ chenggong tongguo zhongguo banyan zhongyao juese” [The Paris Agreement has Succeeded as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ccessed on April 14, 2017).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中評論壇：國民黨兩岸優勢正在流失〉，http://pr.ntnu.edu.tw/newspaper/index.php?mode=data&id=21086，查閱時間：2016/01/10。China Review News, 2014. “Zhongping luntan: Guomindang liangan youshi zhengzai liushi” [Forum: KMT is Losing Advantage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6).

牛銘實，2016，《「2016 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報告書》，美國杜克大學亞太安全研究中心。Emerson Niou. 2016. *2016 Nian Taiwan minyi yu guojia anquan*

minyi diaocha baogaoshu. [*2016 Taiwa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urveys*]. Program in Asian Security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USA.

央視網，2014，〈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http://news.cntv.cn/2014/10/24/VIDE1414150234895413.shtml，查閱時間：2016/02/05。CCTV.COM. 2014. "Likeqiang zhuchi zhaokai guowuyuan changwu huiyi" [Li Keqiang chaired a State Council executive meeting]. (Accessed on February 5, 2016).

吳秀光，石冀忻，2009，〈兩岸談判的雙層賽局分析〉，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239-273，臺北：五南。Wu, Samuel S. G. and Chris Shih. 2009. "Liangan tanpan de shuangceng saiju fenxi"[A Two Level Game Analysis in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In "*Chongxin jianshi zhengbian zhong de liangan guanxi lilun*" [Reviewing the Theory of Cross: Strait Relations], eds. Tzong-ho Bau and Yu-shan Wu. Taipei: Wunan Books.

沈旭暉，2015，〈點評中國：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的十大特色〉，BBC.com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1/151116_cr_xijinping_diplomacy，查閱時間：2017/06/10。Shen, Simon. 2015. "Dianping zhongguo: Xijinping shidai zhongguo waijiao de shida tese" [Comment on China: Top Te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iplomacy during Xi Jinping Period]. (Accessed on June 10, 2017).

林犀，2017，〈北京拋「一中分治」兩岸有望重開新局〉，http://taiwan.dwnews.com/news/2017-03-31/59808385.html，查閱時間：2017/04/17。Lin, Xi. 2017. "Beijing pao 'yizhong fenzhi' liangan youwang chongkai xinju"[Beijing to Throw 'one China but Separately-Ruled，is Expected to Reopen the New Cross-Strait Relations].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7)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8，〈臺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2 年 06 月~2017 年 12 月）〉，http://esc.nccu.edu.tw/app/news.php?Sn=167，查閱時間：2018/02/11。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8. "Taiwan minzhong tong duli chang qushi fenbu (1992 nian 06 yue ~2017 nian 12 yue)" [Taiwan Independence vs. 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Trend Distribution in Taiwan (1992/06~2017/12)]. (Accessed on February 11, 2018).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8，〈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 年 06 月~2017 年 12 月）〉，http://esc.nccu.edu.tw/app/news. php?Sn=166，查閱時間：2018/02/11。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8. "Taiwan minzhong Taiwanren/Zhongguoren rentong qushi fenbu (1992 nian 06 yue ~2017 nian 12 yue)" [Taiwanese / Chinese Identification Trend Distribution in Taiwan (1992/06~2017/12)]. (Accessed on February 11, 2018).

張煒，2016，〈點評中國：六中「核心論」意味著什麼〉，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10/161031_cr_cpc_sixth_plenary_session，查閱時間：2017/06/10。Wei, Zhang. 2016. "Dianping zhongguo: Liuzhong 'hexinlun' yiweizhe

shenme?" [Comment on China: What does 'Core Theory' Mean?]. (Accessed on June 10, 2017).

陳仁澤，2014，〈人民日報盤點習近平執政建樹：鐵腕反腐贏得民心〉，http://news.qq.com/a/20140812/007332.htm，查閱時間：2016/03/20。Chen, Renze. 2014. "Renmin ribao pandian Xijinping zhizheng jianshu: Tiewan fanfu yingde minxin" [People's Daily Inventory Xi Jinping Ruling Achievements: Lronclad Anti-Corruption Won the Hearts and Minds]. (Accessed on March 20, 2016).

博訊，2017，〈《前哨》總裁劉達文：習近平是否眞改革十九大後見分曉〉，https://www.peacehall.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china/2017/01&link=201701231444.shtml，查閱時間：2017/06/10。Boxun. 2017. "'Qianshao' zongcai liudawen: Xijinping shifou zhen gaige shijiuda houjian fenxiao" [Frontline's Chief Editor Liu Dawen: We can See Xi Jingping is Really Promoting Reformation or not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ccessed on June 6, 2017).

華爾街日報，2013，〈李克強經濟學的三大重要支柱〉，http://cn.wsj.com/gb/20130628/bog132744.asp，查閱時間：2016/02/05。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3. "Likeqiang jingjixue de sanda zhongyao zhizhu." [Three major pillars of Li Keqiang economics]. (Accessed on February 5, 2016).

新頭殼，2017，〈中國內鬥：不再集體領導 習近平將權力一把抓〉，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8-07/94352，查閱時間：2017/09/13。Newtalk. 2017. "Zhongguo neidou: buzai jiti lingdao xijinping jiang quanli yibazhua" [China infighting: No longer collective leadership; Xi Jinping will grasp the power]. (Accessed on September 13, 2015).

臺灣指標民調，2013，〈「臺灣民心動態調查、兩岸簽訂協議」民調〉，http://www.tisr.com.tw/wp-content/uploads/2012/06/TISR_TMBS_201306_2.pdf，查閱時間：2015/05/10。Taiwan Indicators Survey Research (TISR). 2013. "'Taiwan minxin dongtai diaocha, liangan qianding xieyi' mindiao" ['Taiwan Mood Barometer Survey (TMBS), the two sides sign agreements' poll]. (Accessed on May 10, 2015).

臺灣指標民調，2014，〈「臺灣民心動態調查、核四與服貿爭議」民調〉，http://www.tisr.com.tw/wp-content/uploads/2012/06/TISR_TMBS_201403_1.pdf，查閱時間：2015/05/11。Taiwan Indicators Survey Research (TISR). 2014. "'Taiwan minxin dongtai diaocha, he si yu fu mao zhengyi' mindiao" ['Taiwan Mood Barometer Survey (TMBS), the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service trade dispute' poll]. (Accessed on May 11, 2015).

臺灣指標民調，2016，〈臺灣民心動態調查、520 及政治人物印象〉，http://www.tisr.com.tw/?p=6745，查閱時間：2017/04/10。Taiwan Indicators Survey Research (TISR). "Taiwan minxin dongtai diaocha, 520 ji zhengzhi renwu yinxiang"[aiwan Mood Barometer Survey (TMBS), 520 and politicians impression]. (Accessed on

April 10, 2017).

臺灣智庫，2014，〈馬總統是否適任？就職 6 周年民眾觀感 民調記者會會後新聞稿〉，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2411/2410/2810/0，查閱時間：2017/04/10。Taiwan Thinktank. 2014. "Ma zongtong shifou shiren? Jiuzhi 6 zhounian minzhong guangan mindiao jizhehui huihou xinwengao"[Whether President Ma is competent? The press release after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opinion polls of the people perception after the 6th anniversary]. (Accessed on April 10, 2017).

遠見民調，2006，〈民眾對兩岸交流與直航的看法〉，http://www.gvsrc.com/dispPageBox/GVSRCCP.aspx?ddsPageID=POLITICS&view=2006&dbid=3852962246，查閱時間：2015/05/10。Global Views Survey Research. 2006. "Minzhong dui liangan jiaoliu yu zhi hang de kanfa" [People's Views on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Direct Flights]. (Accessed on May 10, 2015).

Ariely, Dan, and Michael I. Norton 2008. "How Actions Create–not Just Reveal: Reference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2: 13-16.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Randolph Siverson. 1995. "War an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Typ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841-855.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James D. Morrow,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astair Smith. 1999.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4): 791-808.

Cadilhac, Anaïs, Nicholas Asher, Alex Lascarides, Farah Benamara Zitoune. 2015. "Preference Change." *Journal of Logic,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24 (3): 267-288.

Carlos, Alós-Ferrer and Shi Fei. 2015. "Choice-Induced Preference Change and the Free-Choice Paradigm: A Clarificatio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0 (1): 34-49.

Chen, M. Keith, and Jane L. Risen. 2010. "How Choice Affects and Reflects Preferences: Revisiting the Free: Choice Paradig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 (4): 573-594.

Chen, M. Keith. 2008. *Rationalization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Do Choices Affect or Reflect Preferences?* Working pap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Chiozza, Giacomo, and Hein E. Goemans. 2004.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Tenure of Leaders: Is War Still Ex Post Ineffici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604-619.

CNN. 2017. "How Xi Jinping became one of modern China's most powerful leaders." http://edition.cnn.com/2017/04/06/asia/xi-jinping-profile/index.html (September 13, 2017).

Debs, Alexandre, and H.E. Goemans. 2010. "Regime Type, the Fate of Leader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 (3): 430-445.

Dick, de Jongh and Fenrong Liu. 2009. “Preference, Priorities and Belief.” In *Preference Change*, eds. Till Gruene-Yanoff and Sven Ove Hansson. Netherlands: Springer.

Dietrich, Franz, and Christian List. 2011. “A model of non-informational preference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3（2）: 145-164.

Evans, Peter B.,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1993.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Grüne-Yanoff, Till, and Sven Ove Hansson, 2009. “From Belief Revision to Preference Change.” In *Preference Change: Approaches from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eds. Till Grüne-Yanoff and Sven Ove Hansson, Netherlands: Springer.

Johansson, Petter, Lars Hall, and Nick Chate. 2011. “Preference Change through Choice.” In *Neuroscience of Preference and Choice*, eds. R. Dolan and T. Sharot, Netherlands: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Lang, J´erˆome and Leendert van der Torre. 2010. “Preference Change Triggered by Belief Change: A Principled Approach.” In *Logic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ame and Decision Theory: LOFT 8*, eds. Giacomo Bonanno, Benedikt Löwe, Wiebe van der Hoek.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ume 6006.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Lin, Jih-wen（林繼文）. 2000. “Two-level Games Between Rival Regim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Remaking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36（6）: 1-26.

McGillivray, Fiona, and Alastair Smith. 2004.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turnover on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 567-600.

Milner, Helen V., and B. Peter Rosendorff. 1997.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s* 41（1）: 117-146.

Putnam, Robert D.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3）: 427-460.

Smith, Alastair. 2009. “Political Groups, Leader Change,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3（6）: 853-877.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4. “Chicago Council Survey Shows Americans Support a Rebalance of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ASIA.”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press-release/2014CCSAsiaReport（April 17, 2017）.

Time. 2016. “China’s Chairman Builds a Cult of Personality.” http://time.com/4277504/chinas-chairman/（September 13, 2017）.

Van Eijck, Jan. 2008. “Yet More Modal Logics of Preference Change and Belief Revisio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Games and Interaction*, eds. Krzysztof R. Apt, Robert van Rooij, Amsterdam, Netherlan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Wu, Samuel S. G., and Chris Shih（吳秀光、石冀忻）. 1998. “Domestic Factor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 Model of Two-level Negotiation Game.” *mimeo*.